



我的老师——陈垣先生

柴德赓遗作

编者按：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我们不仅需要大量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专家，而且还必须造就一大批又红又专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材。为了介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情况、鼓励青年攀登社会科学的高峰和积累当代学术史料，本刊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开辟专栏，按来稿先后陆续选登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或自传，并拟同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辑出版《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一书。现在发表《我的老师——陈垣先生》和《胡华自传》。我们希望社会科学界专家和广大读者给予大力支持。

最近我在《人民画报》上看到我的老师——陈垣先生《教育工作六十年》一文，非常兴奋，格外感到亲切。我又一次受到老师深刻的教育。

教育工作六十年，是多么难能可贵、值得纪念的事情！老师桃李遍天下，我在他门下只是一个小学生。记得我初从老师受业那年，他正五十初度，今年则已届八十大庆了。可是，他并不老，在新中国，他的身体越发健康，精神越发饱满，思想越发进步，工作越发努力，他越活越年青，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三十年来，我在老师身边的时间有二十多年，抗战期间到胜

利以后，朝夕相见；解放后，又共同参加了辅仁大学的反帝斗争，和历次政治运动，受他教诲的时间不算短，对他的立身治学，一向是很钦佩的。当此老师八旬大寿、教育工作六十年、特别是他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时候，我愿意从三方面来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以表示我的景仰和祝贺。

一、教学工作

陈老师热爱教育事业，积极培养青年、关心青年的成长。他对教学工作一贯积极负责，他的教学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从不无故请假，从不迟到早退，对全年的讲授和每堂课的内容，有预定的教学计划。他要求同学也很严格，凡是上过他讲堂的人，都会深刻记得：他上课要指名提问，答不上来要批评；布置的作业一定要按期交，不许潦草塞责，潦草的要重做。我一九二九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时候，他正作系主任。当时有些同学有点自由散漫，但是上他的课的时候，大家精神很振作。

他认为读书要先把基础打好，才能循序渐进地学下去，因此他极注意基础课程，他常亲自教基础课，如一年级的国文、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等，在这些课程里给同学以系统的基础知识。他讲解时一字一句从不放松，对同学的作业，一本一本仔细地批阅。特别是批分数，他从来很慎重。他的办法，总是每本先看一遍，大致按程度分为四五个类型，然后每一类中加以审核，或提升，或抽降，这样反复比较，优劣自见。他批的卷子总是以五分十分为差别，得九十分固然不易，得五十分也不冤枉。他不赞成拿起卷子就批分数，认为答文史卷子，一分两分之差没什么标准。他更反对那种“望望气”就随便给分数的办法，以为不负责任；也反对那种给五十九分让同学补考、留级的做法，以为太苛刻、不合理。他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仔细

加以研究，有自己独创的办法，这不过是其中一例。

他为了把自己的知识，清楚扼要地传授给同学，他很重视课堂教学，为了使同学们听课后有实际练习的机会，以提高独立工作能力，他又重视实习，因此他的备课非常认真。他开设“史源学实习”这门课，有时拿《廿二史札记》，有时用《日知录》等作为教材。他讲《廿二史札记》时，先把这书里有问题的地方逐一研究，讲《日知录》时，就把顾亭林所引原书一一核对，都是化很大工夫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四二年他为辅仁大学研究生开《中国佛教史籍论》一课，真是以狮子搏象的力量来备课，从《大藏经》及有关史料中搜集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写成论文底稿，再来讲授。这种对教学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尤其是今天我们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教学相长的原则下要求教师起主导作用，我从他身上得到许多启发。

陈老师不仅自己要求严格，对同学们要求严格，而且对青年的鼓励与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作业做得好的，当堂表扬，有时亲加批点，张贴出来，让大家观摩。同学能发现问题、提出意见的，他更加鼓励。他要同学常进图书馆，多看参考书，并指导同学自己去找材料解决问题。如果能写成文章请教他，他最为高兴，一定给你认真改。这种帮助，是最难得和最有效的办法。他素来门无杂宾，座上客多半是朋友和学生去谈学问的，他应接讲述，乐此不疲。有的本来不是他的学生，因为以文字求教的关系，或则千里通讯，有问必答，以后自称弟子的也不少。他热爱青年，培养后起人才，在这方面，对学术文化的贡献也是不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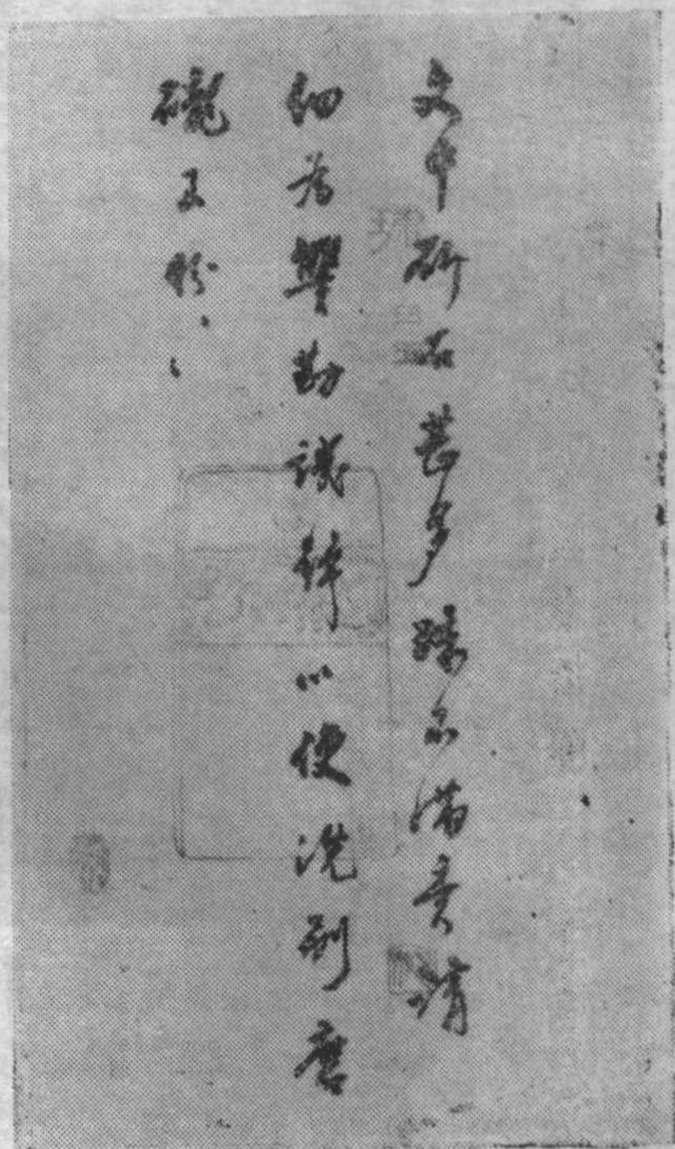
二、治学精神

陈老师的学问是多方面的，有人说他是元史专家、宗教史专

家，这话并不错。但他对年代学、校勘学、目录学、史料学、避讳学等，既博且精，都是有书为证，为大家所熟悉的。这无庸多述，我只就他的治学精神谈一谈。

他治学有坚忍不拔的毅力。遇到困难，不是在困难面前退缩，而是设法克服困难，往往追根究底，一定要作出一个结果来。如他在三十多年前，读书时遇到中西历对照的困难，研究回教史时遇到回历上的困难，历史记载常有几十年的差异，不易解决。当时还没有完整的有关中西回历对照的书，他就发愤要做一部精确的日历表，为研究者铺平道路。于是他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做了一部《中西回史日历》、一部《二十史朔闰表》。有了这些书，然后年代学就可以讲得清楚。校勘学也是如此。他校了一部《元典章》，总结了经验，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实即校勘学释例。他提出四种校书方法，由浅入深，综合利用，这样，校勘学就具体而系统了，比空论校勘方法的就大大提高了。他又因历史书籍上的避讳，给史学工作者增加很大障碍，就搜集了较完备的避讳材料，做成一部《史讳举例》，简单扼要地总结了历代的避讳，并说明这是封建时代的产物，虽然给治史者造成困难，但正因其复杂，转可利用以审定史料的时代。

他治学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重实践，不尚空论。他每研究一个问题，必先充分掌握史料，非不得已不用第二手材料。为了把问题说得透彻准确，对有关的史料都是千方百计地多方搜集，尽量求其完备，他写一部著作，往往引书达一二百种。他年青时学过西医，就把西医的解剖学、诊断学的方法应用到史料考证上来，实事求是，尽量使其客观、准确。没有充分证据，他不轻下结论；这样，才使所作出的结论，都比较符合事实。如果他能更早一些时间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那末，他在史学上一定会有更卓越的成就。



⇨
 文中砂石甚多，殊不
 满意，请细为錐勘、
 讯弹，以便洗刷磨
 着，至盼至盼。

附录一篇已托晚兄转呈考证文最患不明白令人易于
 误会又患有可省不省之字句关于此二点希两兄为我尽力挑剔
 俾得改定至以为感专悬并颂晚峰青峰两兄著安陈垣谨上
 十月十八日

附录一篇，已托晚兄转呈。考证文最患不明白，令人易于
 误会；又患有可省不省之字句，关于此二点，希两兄为我尽力挑剔，
 俾得改定，至以为感。专悬，并颂晚峰、青峰两兄著安。陈垣谨上。
 十月十八日。

他在史学上所以取得成就，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的干劲。从我与他接触时起，直到七十岁为止，他总是半夜四点钟起来读书写文章，几十年从不间断。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常写论文，他说多练习才能多思考，才能进步快。他确是这样策励自己，从一九一七年发表《元也里可温考》起，三十年中，每年都有重要著作发表。记得抗战期间，他为了要到一个人迹罕至的藏书处去看《嘉兴藏》，那个地方蚊子很多，他总是天天先打了预防针，然后去看书。这种干劲，很多人是办不到的。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新社会的一切，更给了他新的动力。虽因年岁和身体关系，医生要他多休息，可是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对国家重大问题、党的方针政策，经常发表文章，影响很大。今年七月初，我到北京，还见这位八十岁的老人拿着放大镜孜孜不倦地校订《册府元龟》和《旧五代史》。听说他还时时指导科学院的研究生进行研究。这种锲而不舍、不知老之已至的精神，我们年青的人比起老师来，干劲差得多，说来实在惭愧。

此外，他治学的谦虚态度也值得我们学习。他很愿意朋友对他的著作提意见。他常教导我们，论文写成，要多请朋友看，多请人提意见。他作好文章总是请三种人看：请专家看，请同辈朋友看，请学生看。我作为学生，常能先读到他的文稿。他的文稿并不是一挥而就的，常常是反复修改，改到四次、五次才能定稿，因此，我也常是看过几次。读他的文稿，是有要求的，要从内容到文字提出意见，意见不怕多，但偏偏不许说捧场的话。我手边留着 he 给我的一些便条，大都是为商量文章的。如：“文中砂石甚多，殊不满意，请细为雠勘、讥弹，以便洗刷磨砉，至盼，至盼。”又如：“承示各节，应时改定，倘有疑义，仍请不吝指摘，俾加邃密，至以为感。”我今天再看这些话，觉得他谦虚认真的精神，真可感人。正因为他热情的鼓励，我也就敢于畅所欲言

言地提出问题；即使极不成熟的意见，甚至吹毛求疵以不误为误，在老师面前也没有顾虑，反正说错了，老师会指正的。从这里我学习了更多的东西。后来我也写一些论文，老师说：“你为我看文章多了，这回我得好好给你改文章。”可惜我写得少了，不能争取老师更多的帮助。但是，老师虚怀若谷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三、政治态度

当我初认识陈老师起，就觉得他喜欢谈学问，不喜欢问政治。他从前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因此，他就更加努力钻研。抗日战争起来，北平沦陷了。老师一腔热爱祖国的热忱，坚持民族抗日立场，充分发扬了坚贞不屈的精神。当时他杜门谢客，不与汉奸、日本人往来。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一个日本帝大的教师，自称是研究东方思想的，特地请一位日本老博士（是陈老师的老友）写了介绍信，说只是谈学问，一定要求见。老师不得已，同意见他。那个人刚说明来意，老师就非常严肃地说：“你要研究东方思想，怎么来到北平呢？北平现在沦陷，有什么真思想可谈，你有胆量就到我们抗日后方去了解。”这个日本人连说：这些话是来北平后第一次听到，别处也是听不见的。那天恰好我在他书房中，见他这种正气凛然的态度，我几乎感动得下泪。这一时期，他的著作像《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文章的风格已和以前不同。从前他的著作，真积力久、功夫深厚，议论比较少。这时的著作，议论风生，大都有为而发，积极抒发民族抗日情感，鼓舞人心，表达了他热爱祖国的思想。

抗战胜利前的后两年，我在四川，四六年才返北平，又和老师

见面。胜利后，老师最初对局势寄以莫大希望，以为今后可以过安定日子，国家地位亦当有起色。自从劫收大员到北平，作威作福，贪污腐化，反动政府怯于抗日，勇于内战，置民生痛苦于不顾，他非常气愤。当时《通鉴胡注表微》一书正要定稿，他补上一篇《货利》，一篇《民心》，《货利篇》明斥“发国难财”的人，《民心篇》提出“外战犹有民族意识为之防，内战则纯视民心之向背。”他对国民党的不得民心，从厌恶到痛恨，虽然终日从事著作，总觉得没有出路。记得有一位老先生七十双寿徵题词，他题了十二个字：“国家宁，是上寿；子孙贤，是中寿。”这正是他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当时正是国家不宁，他认为生逢丧乱，不能救国救民，空有长寿，没有什么意义。从抗战时期起，许多青年离开北平，积极抗日，他支持这种正义行为。胜利后，内战起来，学生因反饥饿、反内战而被捕了，他到反动政府的警备司令部去坐索学生。他认为革命青年最有希望。这又说明他非常关心祖国的命运，可这时是他自己还没有找到一条应走的道路。

直到北平解放前夕，他坚决拒绝乘坐反动政府接他南下的飞机，决定留下来迎接解放，这时思想准备就比较成熟了。解放后，他细心地读了《毛泽东选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书，兴奋极了，以为这些道理，真是闻所未闻。他说：“可惜自己闻道太晚了”。他目睹解放军的纪律、人民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一样不满意，真是从心里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经过党的教育帮助，和在实际政治运动中的锻炼，他对党的认识，逐渐深刻，最后毅然决然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意为党的事业贡献一切，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是在党的关怀与培养下，一步步地发展，一步步地巩固提高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这是旧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取得胜利的一个典范。从他生平来看，他是一个极刚强的人，但他是一个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人。他从不轻易参加

党派团体。他年青的时候，广州很多人和康有为有关系，他虽宣传维新思想，却不是康派；后来参加新闻工作，积极鼓吹革命，也没有加入同盟会；他当辅仁大学校长多年，辅仁的天主教会年年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加入天主教，但是他们失败了，老师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以八十高龄的老翁，却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不了解他的人看来，也许会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找到真理、找到归宿了。他是一贯爱祖国爱民族的人，他逐渐认识到党是中国人民指路的明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就毅然决然跟着党走。他严格地要求自己，认真地加强自我思想改造，提高阶级觉悟，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投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他更迫切地要求以自己的余年对创造人类美好的理想社会贡献出一份力量。党批准了他的要求。这是党对他的信任，是他的光荣归宿。我为老师教育工作六十年而祝贺，为老师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而欢呼，更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所取得的胜利而欢呼！

我要永远向老师学习，做他的小学生，踏着他所走的道路前进。在党的领导与关怀下，我更要信心百倍地加强自我改造，努力学习，认真劳动，积极工作，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九年十月于江苏师范学院

后 记

著名历史学家柴德赓先生，已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十年前，他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含冤逝世。当时消息传到北京，他的友好、学生都不相信这样健壮的人，竟会突然死去。但这不幸的消息终于被证实。

柴德赓先生（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幼年在家乡读小学、中学，一九二九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来到北方。一九三六年后，在辅仁大学历史系任教。

一九三九年，我考上辅仁大学历史系，他给我们班讲授《中国历史纲要》。他讲课条理清楚，内容充实，语言生动，是最受我们欢迎的老师之一。

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一九四三年底，他和柴师母陈璧子同志带着四个儿女全家离开北平。一路经河南，过陕西，转入四川。到达重庆后，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历史系教课，兼图书馆馆长。抗战胜利后回北平。

解放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一九五五年，北京师范大学支援全国各地师范院校，他响应号召，服从分配，调到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全家搬到苏州。

他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一直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他的课业和文章，时常得到当时师大历史系主任陈垣老师的称赞。课外他不断到陈老家中求教，得到陈老的细心指导和具体帮助。到辅仁教课后，他们住得很近，他经常在晚饭过后，便到陈老家夜里谈。他们一同研讨文史，讲论学术，有时师生二人谈得高兴，索性把椅凳搬到陈老“励耘书屋”的书库里，坐在一排排书架走

道中畅谈，一面讲述，一面随手抽出书来翻阅指点。有时谈得兴高彩烈，也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们常常谈得忘记时间的早晚，一谈就谈到深夜。这时期陈老撰写文章，总要送给他看，请他提出意见，两人一起探讨商量；他这时期所写的文章，也大都得到陈老的指正批改。

一九六四年，陈老正进行着点校新、旧《五代史》的工作。这时陈老已年过八十，社会活动较多，其他工作也很繁重，因此教育部将他借调来京，我们一同帮助陈老点校《五代史》。当时已初步写了校记，但后来这份底稿竟未找到下落。

一九六六年夏，他回苏州参加文化大革命，刚下火车，在返回江苏师院途中，就被戴上高帽，游斗回校。以后几年，他遭受种种迫害，身体、精神都受到严重摧残。一九七〇年一月廿三日，他正在郊区农场参加劳动时，由于体力不支，心脏病发，救治不及，死于路旁。去年五月廿三日，江苏师院召开了追悼会，为他平反，沉冤得以昭雪。

他几十年来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得到陈老亲切教诲。他长于考据，对中国历史要籍多所钻研，对五代史、宋史、清史及辛亥革命史都有较深研究。曾撰写《〈鲋埼亭集〉谢三宾考》、《〈资治通鉴〉及其有关的几部书》等论著三十余篇，散见于报刊杂志。现在我们正着手编辑他的专集。

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应柴师母邀，纪念柴先生逝世十周年，因以十年前旧作直幅敬献：

从此人天隔死生，哭君涕泣不成声。
别来三载音容在，风雨横摧吴郡城。

良师益友卅余年，回首前尘话万千。
知否励耘深系念，忍将“无恙”告师前。

不成为诗，仅记下他逝世时悼念之情，当时陈老尚未逝世。

这里发表的《我的老师陈垣先生》一文，是一九五九年北京某报刊为陈老入党特约的稿件。文中所谈的《人民画报》，指一九五九年第十五期（八月一日出版）。所说陈老的年岁，都指虚岁。此文脱稿后，柴先生曾先寄陈老看过，陈老非常谦虚，让他不要发表，只是去信希望他努力学习，提高思想觉悟，争取入党，早日实现他在这篇文章中自己提出的愿望。

今年是柴先生逝世十周年，也是陈老百年诞辰，《文献》丛刊特发表此文，以为纪念。

刘乃和识 1980年4月